

东方版父子冲突

——重读朱自清《背影》

□陈 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第一次读朱自清的《背影》记得是在中学的课本中，当时的课本里还收录了他的其他几篇散文《荷塘月色》《春》等。在那个似懂非懂的年纪，我在读过的这几篇散文中最喜欢的倒是抒情散文《荷塘月色》，只觉得说不尽的美，堪称美文典范。到今天为人父母的年纪，提到朱自清最先回忆起的倒是《背影》。《背影》不衰的魅力人所共知，今天重新捧读它，却是别有一番感触。

《背影》通过一段极其普通的火车站送别的故事描述父子之情。这样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各种艺术门类中该题材的作品亦比比皆是，但为什么《背影》的魅力能历久不衰？从

文字、修辞而言，这篇散文非常平实，选题也平常，但在平常中却透出深刻的哲理。《背影》绝不是简简单单地描述父子情深，而是体现了朱自清对父子情感深层认识的心理历程。我们先将《背影》放到朱自清先生的整个创作道路中，不难发现他在《背影》（一九二五年）前写过《父母的责任》（一九二三年），之后一九二八年又写下《儿女》一篇。从这三篇散文中我们完全能体会朱自清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的态度和见解。在《父母的责任》中，朱自清谴责那些滥用生育权和教育权的父母，谴责那些将自己的儿女当作挣钱养家、光宗耀祖的工具的父母。“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

彩，而到了晚年却力求朴素，把情感转向比较深沉的内涵了。这就提供了另一种境界，懂得多种境界及其发展转化，对于我们的写作和欣赏无疑提供了更开阔的天地，写作起来，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五、还原方法的具体运用

《荷塘月色》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那时最热闹的要算是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鸣，不过，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他并没有把荷塘月色全都写进去，只是写了和他情感相通的一个方面。否则就不能取得《荷塘月色》的和谐意境。

从《背影》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省略，作者的回避（如有一个材料说，他是在家乡工作了，工资却被爸爸去拿了，而不愉快，才促成了他写这一篇表示忏悔的文章）。从文章中看，写到父亲与他的矛盾，“触他之怒”，“待我不如往日”，“我的不好”，都含含糊糊。被省略了，被淡化了。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种启示，文章的好处不但在于他强调了什么，而且在于他省略了什么。这一点对于欣赏有好处，对于写作更有好处。只有知道要省略什么，不写什么才能有自己的个性，才能找到自己，有了自己的特殊的感情和情感，才会知道应该写什么，强化什么淡化什么。

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有哪个真能‘自遂其生’的！他们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待遇他们，结果是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牺牲！这样尽量摧残了儿童的个性与精神生命的发展，却反以为尽了父母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的君权、父权统治社会，做子女的是没有一点权利可言。做女儿的得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这是她们生活的惟一目标和目的。做儿子的更是可怜，得担负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重任。然而做父母的本应以儿女为本，以社会为本，“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这就是朱自清理解的“生物学、社会学所指给的新道德”。他对父母责任的理解非常有远见，甚至适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想想我们今天的父母们依然沿用着特别“中国”的模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赋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就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他们的命运，规定他们的道路。朱自清在《父母的责任》中从社会学、生物学等角度，阐述父母的责任，而在一九二八年作的《儿女》中他检讨自己，忏悔自己对儿女的态度：“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他已深感传统父权思想使儿女遭受不公对待，甚至是摧残。《儿女》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深知自己责任的父亲的无奈和辛酸。

从《父母的责任》的慷慨激昂到《儿女》的无奈与忏悔交织的回忆，朱自清为人父的深刻体会及《背影》中的心理变化无疑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我们将三篇散文串联起来，看到的是一幅从年轻的儿子与父亲的冲突、血气方刚的年轻父亲的呐喊、面对年老父亲的妥协到为人父的感慨与自勉的真实画面。《背影》是一篇叙事散文，展现给读者父子间产生的冲突和东方式的结局。散文如作者所言是因父亲给他写的一封信而起，这封信也是父子关系的转折

点。“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朱自清自己的文章和家人所写的回忆录中关于他和他父亲之间关系的记载不多，这一段算是比较详细的介绍。在他幼年时，父亲因为忙于生计，家庭的压力很大，待他并不好，到了“大去之期不远”时，“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办完祖母的丧事后，“我”要回北京去，父亲对“我”不放心，再三掂量，还是决定自己去送行。年轻的“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想让他送。在送行的过程中，父亲仍然把“我”当成未见过世面的孩子，千叮咛万嘱咐。“我”嘲笑父亲的迂腐，觉得自己很聪明，比父亲更有能力处理事务，父子在行动和心理上进行了一番较量。在父亲去买橘子之前，新一轮的力量和能力的对比在“我”的心里依然占据上风。“进一步说，随着孩子的成年，就会有能力从表面上区别父亲意志的合理和不合理，就会认识到其中有些是荒谬的。如果父亲的意志类似暴君的意志，他的命令荒谬和孩子认识到这种荒谬，也很少有可能改变这种权威的效力。结束这种无可忍受的状态的办法是很多的。”^①儿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直到父亲提出去买橘子，拖着肥胖和吃力的身子爬上爬下，“我”望着他的背影一次又一次落泪。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背影是他衰老和承受压力的毫无遮挡的暴露。面对父亲的背影“我”的内心放弃了反抗，放弃了自己体力和智力上的优势，向父亲彻底地妥协。这种妥协完全符合东方的伦理道德，也是调和父子冲突这一基本矛盾的办法之一。

关于父子关系，相对于我们这个强调权威和服从的社会，西方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等各方面都研究得十分透彻，其中弗洛伊德提出的“俄底浦斯情结”最为人熟知，但多把它与乱伦和性本能联系在一起，其实弗洛伊德在

《梦的解析》中对父子关系除了上述的缘由也还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我们首先必须将我们传统行为标准或孝道所要求于我们的父子关系与日常真正所观察到的事实分别清楚，那就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间确实隐含着不少的敌意，只是很多情况下，这些产生的愿望并无法通过‘检查制度’而已。且让我们先考虑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最低以及最高阶层里，对父母的孝道往往比其他方面兴趣来得逊色，由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民间小说等均使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有关父亲霸道专权、擅用其权的轶闻。……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父亲仍都对其由来已久的‘父性权威’至死也不放手。”^②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神话，还是中国古代历史，儿子为了满足父亲的权欲，慑于父亲的淫威违背自己的本性，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生命，这样的事例还少吗？《背影》之所以留下如此令人震撼的影响力，也许正是与悲剧俄底浦斯一样，它触及到人的深处的某种共性，产生共鸣。这种父子冲突再普遍不过，几乎不受外因的影响，因而在任何社会都会得到响应，不同的只是结局。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如此解释这部悲剧能使现代的观众或读者产生与当时希腊人同样感动的原因：“这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特别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的某种特质。……命运的震撼力必定是由于我们内在也有某种呼声的存在，而引起的共鸣。”^③

在西方文学中父子冲突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亦是反权威的标志之一。卡夫卡是最具有典型性的作家，他创作的许多作品（如《变形记》《判决》等）都反映这一主题，而他本人和他父亲之间完全是父子冲突的西方版本，他和父亲的冲突到达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我的作品是关于您的。在其中我倾吐了那些我不能在您的怀抱中所倾吐的伤心事。除非受到您的强制，在我能够自主的时候总是故意久久地远离您。”^④卡夫卡就是以这种方式强调他毕生

同父亲所作斗争的重要意义的。^④这种矛盾被长期压抑，而这种压抑越强，反抗也就越强，或是回到无意识中，或是以艺术形式升华。弗洛伊德充分肯定了父子冲突对卡夫卡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就卡夫卡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审美良知和意识受到个人的经历很大的影响而言，必须承认，这样的父子关系相应地产生了卡夫卡的特殊风格和特点，这正是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⑤卡夫卡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与接受东方传统文化教育的朱自清不同，他无法理解他父亲对待儿子的方式，也无法理解以父亲为象征的权力和权威。他感到既不能因为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而采取妥协的办法，也不能对这种最合理的关系置之不理，因而无法调和矛盾，无论在生活还是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矛盾总是以激化的形式出现。

无论朱自清，还是卡夫卡，涉足父子冲突这一主题都是“意在表现自己”，暴露人性中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不会因为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回避而消失，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以各种方式消解或爆发。作家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性的自己，无论是朱自清的含蓄，还是卡夫卡的浓烈，都给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就个体而言，卡夫卡堪称现代派运动的先驱，而朱自清在新文化运动中已是一面旗帜，他们的魅力在于带给我们内心的震撼，让我们共同呼吸、共同思考。

① 参见：《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思想》，霍夫曼著，王宁等译，第229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② 参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著，赖其万、符传孝译，第183~18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参见：同上，《梦的解析》，第188页。

④ 参见：同上，《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思想》，第215页。

⑤ 参见：同上，《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思想》，第221页。